

# 西方语境下的浪漫主义思潮与文学分期

罗 昔 明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要:**要严肃探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分期问题,必然面对文学与历史的纠结,因为我们考虑文学和历史的时刻,在多样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往往彼此视为对手。将历史绘制为不同时期所运用的各种标准是在构成人们自己的“时期”语境中先前思维承担的结果。历史的分期持续怀有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印记。从浪漫主义思潮角度重新思考分期化问题可以说明多样性是历史时期过渡的界定性特征。

**关键词:**时期;文学分期;浪漫主义思潮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3-0074-06

要严肃探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时期划分问题,必然面临文学与历史的纠结难题。将历史绘制成不同时期所运用的各种标准,是在构成人们自己的“时期”语境中先前思维承担的结果。历史的分期持续怀有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印记,它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分期,所有有关分期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回归到这个时期,因为浪漫主义已成为通向文学分期的桥梁。

## 一 文学分期意义上浪漫主义思潮的本质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指出,浪漫主义历史时期“是蕴涵着一种历史秩序的支流时刻,这种秩序本质上构成了浪漫主义一定的主题”,“相关的关注和讨论,也应视为浪漫主义一部分或浪漫主义产生的一种影响”<sup>[1]</sup>。德里达的评论尽管主要关注浪漫主义“时期”类型概念的变化,但同时也指向了浪漫主义作为真实历时可变性标记(各种时期)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如果不坚信历时可变性的现实,那么任何分期观念和实践将仅仅成为一种惯例或便捷。在信守真实历时可变性下,各种时期就可能因作为现实本身变化的指示器而变得极具意义。正是这种

历史感——既非仅仅作为历时编年,也非表面性变动或一种永恒本质范例,而是一种不可逆的实质性差异的延展,常常被设定为浪漫主义的独特贡献。这一创造的动机可能有多种来源,但主要归功于资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正在产生的中产阶级,由此产生了一种允许它自己生产的历史理论。施莱格尔(A. W. Schlegel)宣称:“作为我们充满激情表达整体存在的浪漫主义,必须承担不同时代新的和独特的形式。”<sup>[2]</sup><sup>50</sup>他暗指时间之流中的不同时期有一种团体中的个性自由身份;无论它可能被怎样表达,我们都能在浪漫主义时期找到文学分期问题的根本核心点。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指出:“如果某人写从古典主义作家到浪漫主义作家的阶段性历史,他成为浪漫主义的;如果某人将二者理解为一种独特本质的纯粹变体,那么他是古典的。无论选取那种办法,作家为了判断(甚至扭曲)他者而采用适用于这些时期中的某一个的立场。”<sup>[3]</sup><sup>289</sup>唯一避免这种两难的方式是寻求第三种立场,由此其他两种立场的意识形态预设能够得以调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立场,我们将在文学史叙述的分期化修辞与我们所

收稿日期:2009-12-25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 2009 年优秀博士生培养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9041)。

作者简介:罗昔明(1979—),男,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欧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参与的非历史阐释实践之间混淆不清。著名浪漫主义研究专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谈到“浪漫主义思想和文学代表了西方文化一种决定性的转向”时<sup>[4]13</sup>也深陷这种混淆之中;他事实上将这种决定性转向视之作为一种迂回之路,最终回到“思考人类本质和人类历史的古老问题、术语、方式”<sup>[4]15</sup>。他所认知的浪漫主义观念,是对建立在创造者与其创造物和创造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传统观念、方案和价值的“原始文本”<sup>[4]17</sup>的出离与复归。

当我们书写对历史事实来说所流逝之物时,我们参与了叙述过去的实践,为此,我们必须协调两种原初的心理欲望之间反向的牵引力:一种是重复、身份、同一性,另一种则是差异和变异。当我们书写对历史理论而言所流逝之物时,我们也似乎不可避免地站在欲望的这边或那边,结果发现我们自己结构原则和终极目的要么共时要么历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持续称谓的浪漫主义时期向后人提出了历史之中的历史问题,尼采称之为“隐藏在所有事件背后的艺术意义和隐含意义”<sup>[5]21</sup>。我们对浪漫主义的处理方式,将是我们在最深刻的层面上怎样对待历史时期概念的试金石。如果我们认同尼采的预言即“通常浪漫主义的终曲”终究会“在一种陈旧的虔诚面前回归或崩塌”<sup>[5]25</sup>,那么我们需要以自己形象解读浪漫主义的方式来接合这种结果,这种方式产生了一种我们自己对时期的内化叙述,而非一种外在过去的叙述。更早的各种时期依赖我们自己时代的支配性视野,特定时期的历史意识不可能以“无中介”的形式存在。与之相关,产生于与意识体验紧密关联的胡塞尔现象学的“期待视野”不可避免被带入艺术品创作和阅读中,但它不能被作者、同代者或后来的读者客观地把握。期待视野是理解性的基本前提,也是使意识的存在成为可能的前提,但它自身不能在一种意识模式中被意识把握。尽管缺乏那种能力,我们能够描述我们之所见,能够利用我们的理解力所及之洞察力推断一些事情。如此一来,我们有望参与一种批评,尽管这种批评不是向过去的“真理”或者“其他人的真理”致敬,但可能是我们时代的可理解性建构,以致我们处理文学史问题的努力将成为我们对他人他们的时间序列中与之搏斗的那种文学史的贡献。他们可能回望,我们在把自己的立场自身仅仅描述成一种历史性相对成分,而非绝对洞见中所显露的犹豫和无奈。对此,怀特(Hay-

den White)明确地指出,“一个时代的学识,不可能被正处于自身时代庇护下而运作的那些人所把握”<sup>[6]</sup>。这表明我们的认知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错觉,而非一种超验的真理。但若如此,那么时代的学识不就成了—种偏见性洞察吗?那种洞察有必要在不同的条件下重新审视吗?

鉴于这种悖论,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思想的持久目标是以一种叙述形式的自我界定模式,藉此一种“当代性”在与一种被理解为本质上不同的过去相对照中界定自身。德曼(Paul de Man)的观点相当中肯:“当代性诉求萦绕着所有文学。它在无以数计的镜像和各种时期所呈现的标记中得以揭示。没有真正文学叙述能够绕开实现自身时代文学持久性这种单一时刻的诱惑。‘即刻性’的诱惑构成了一种文学意识,同时也必然包纳着一种文学特异性的界定。”<sup>[7]152</sup>文学持续的历史运动,是致力于身份界定的努力中对旧有界定的持续再界定。像组构空间的地图一样,历史依此组构时间,各种时期成为可用的标记单位。浪漫主义所激起的历史中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揭示了文学当代性的诉求,其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信奉的一种进步论历史观。进步论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人类在崇高目标的引导下由低级到高级、由原始到现代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代表着随时间延展的“当代性”或未来的人类思维认知才是更具优势更具价值的东西。因此对于自感优越于过去的当代智力应用而言,文学探究者渴盼的就是怎样尽快地把当代心智“转型”为知识体系,体现出历史进步性。这个话题所具有的迫切性,是我们渴望获得反映自身形象的一种历史形式的迫切性,在一种当代性思维的前提下力图把文学现象辨析成一种具备了分期化特质的知识体系。这种辨析明显地显现为文学在当代学术体制中安排一个功能性位置的焦虑之情。

## 二 文学分期维度中的历史化与去历史化

在造福于我们自己的当代性中,界定文学的各种分期及它们之间的变迁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将自身共时的和概念的二元对立进行历史化。巴特(Roland Barthes)宣称有一种“基本的文本类型学”:封闭性“可读的”文本和永远未完成“可写的”文本,这种区分是非历史、伦理的、描述性的。可写的文本是经由古典主义、可读的、巴尔扎克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本到现代开放性文本的一种历史持续进

步的结果<sup>[8]258-294</sup>。在同类历史化实践上,卢卡契(Georg Luacs)依照对立的意识形态视野将巴尔扎克视为超验的现实主义“经典”范例,使他能够把随后的小说史界定为通向一种颓废的现代主义的衰退轨迹;在这两种情况中,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东西具体化为一种历史现象,这种现象构成了历史性新生不同质之物的出现得以追溯的根基<sup>[9]1-34</sup>。这些观点在意识形态和伦理判断与文学史绘制之间暴露的混乱,是处理历时现象诸多努力的典型。像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表明的,那种实践仅仅通过历时洞察的错觉以及非本质性(外部)视野的方式才变得可能;“无论你何时搜寻‘现实主义’它都将在某处奇特地消失,因为它仅仅是一个符号或标记,是一种允许现代主义现象合理地得以突显的‘此前’”<sup>[10]233</sup>。巴特、卢卡契以及詹姆逊所设定的基本对照,类同于席勒的“素朴的”和“感伤的”的主观精神类型学或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的生理学二元论。对此,斯特劳斯(Levi-Strauss)说:“我们以一种体系的悖论而告终,同时援用了‘文明化的’辨识‘原始的’的历史意识标准,但是体系自身是非历史的。它提供的不是历史具体形象,而是一种人为制造历史的抽象概要,使得他们自身在他们的生活趋向中体现为共时的总体性。因此,它的立场与历史的关系,类同原始事物与永恒过去的关系,历史从中到了一种神话效用。”<sup>[11]254</sup>

这种从心理学和主观迫切性制造历史的趋向,在布鲁姆(Harold Bloom)那里得到了“历史的”发展。布鲁姆回应了黑格尔的历史在1806年(10月拿破仑在耶拿胜利时)已经终结的断言,认为作为文学象征的“诗歌大概在那时也终结,终结于华兹华斯的危机诗歌设定了一种随后强力的诗歌似乎注定重复它的模式”<sup>[12]62</sup>。布鲁姆的理论预设了一种共时的“原始焦虑”,它先于任何其他动因。最初的历时可变性理论转化为历史的心灵形式,文学成为对原初情境无休止的重复。由此焦虑也承载着先于任何激励物的原罪,诗人并不因为他们有先驱而焦虑,而是因为他们焦虑而有先驱。布鲁姆的思想轨迹历经的十年之期是一种对历史拒绝的微型历史。这种历史从不同层面归咎于尼采、一般浪漫主义作家、结构主义、弗莱(Northrop Frye)或者新批评。我们处理文学史的努力,引导我们凝聚在浪漫主义“时期”,以此作为最有可能提供我们理解历史本质本身的证据

和材料,作为性质的变异或者作为原型的重复。相比于簇拥在浪漫主义标题下的那些文本和事件记录而言,思考文学史的努力更加令人困惑。它再次通向了对对立观念置于历史过程的调解之中,通向了导致历史中历史终结的某种历史版本,通向了一种思想仅仅作思想而思考自身的状态,从而摆脱了历史决定论。要思考或者想象历史,我们必须超越它,随后以一种由心理化的空间版本结构回归它,这种空间摆脱了历史,由此我们将历史绘制成一种形式结构,“现实经受渐升的净化,在时空平面上,终结于二元对立的连续性简化,成就了一种无穷尽的景观神话地形学”<sup>[12]218</sup>。

在斯特劳斯、弗莱等人的理论体系中,任何可能的历史变化或者运动囊括于神话的封闭结构中,任何历史地个人化的意义或者身份的可能性并入了对任何历史进程有着优先性永远完成的体系。在对恩格尔的评论中,贝特(W. J. Bate)认为在浪漫主义“最伟大变迁”中,“核心概念”是替代了“模仿”的“创造性想象”,“想象力这个新概念由浪漫主义者开创的”<sup>[13]</sup>。鉴于作为“思维活动”(acts of mind)的历史概念,除非我们假定在“思维”自身中的一种根本变化,否则会持续地将我们对“历史”变迁的“发现”无限期地回推时间之流,持续地将我们的二元对立置于我们能够积累的任何历史数据之中。无论如何,这种思维活动的阶段在贝特和恩格尔看来,笛卡尔的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设立将心智从它的对象中分离开来,解决的办法是想象被推进缺口之中。很难将此视为严肃的历史思想,因为两个不同但相关的原因。第一,在此思维活动被视为自我决定,而没有将之与那个时代(或者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联系起来。第二,被呈现为历史的东西,恰好是一种思维(创造性想象)模式的起源神话,这种思想能考察历史(作为“对象”)而摆脱任何来自于那种对象的决定性。在一种自我确证的循环中,摆脱了历史的思想的起源历史本身就是摆脱历史的思想的产物。文学史本身由此成了创造力想象的产物。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在这种模式中得以实践的真实历史主张,可能被全然抛弃,而明确让位于想象或者思维的创造性力量。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普森(E. P. Thompson)是对浪漫主义解读的另一经典范例,确立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浪漫主义解读模式。威廉斯

认为,浪漫主义传统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特性,是对资本主义兴起一种深刻而有力的反抗,直到它吸纳进 20 世纪的工人阶级文化<sup>[14]59-81</sup>。他认为,“20 世纪后半叶‘文学’明显的危机,是基本物质生产改变了进程和关系的结果;艺术实践必须始终被界定为在一定必要的条件中为了特定的目的作用于物质的工作”;正是 18 世纪一般生产模式的特定变化导致艺术的理想化,为了将之从“机械的”作品中区分开来,一种理想化的“后来阶段”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形成的东西的间接(有时是直接的)对抗<sup>[15]160-161</sup>。汤普森认同这种对浪漫主义兴起的一般性阐释,对汤普森而言,这是一种浪漫主义冲动和信念的实践,为了创造性和目的性结果而解放想象的方式,在“有利地势”中批评现存社会和以更好的方式和欲望引导欲望。在援用这个优势点作为逃离资本主义发展的求助对象中,汤普森强化艺术与历史(或政治)的对立,那就是我们怎样从浪漫主义中来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境的历史<sup>[16]725-790</sup>。

我们回到思考历史与思考文学之间的分野问题,非历史思想也许在两个领域都处支配性地位,必然涵盖文学史领域。我们的存在一直是由思想和建筑模式主导的共时“时期”,这种主导的意识形式是空间的、视觉的、可见的、结构的而非时间的和历史的,因此这种走向文学与历史的再联合姿态似乎不可避免仅仅能够历史化地分离自身,生产一种出离历史而进入共时模式的神话模式。日益明晰的是我们正经受着一种欲望冲突:过去分成可辨别的时期无论对过去还是对现在而言它们都是确定性的存在,是等待历史学家发掘和绘制的真实实体领域。即便如此,鉴于我们不能客观地陈述过去日益增长的证据,必然有意无意地将之建构为我们自己的创造。尼采不仅仅杀死了上帝,他也杀死了实证主义历史,替之以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相对论,使过去的“现实”从属于当前或者未来的需要,一种当下性的历史观点,给予我们过去的观点而非过去的真理。传统历史相对论死亡的另一根源在于,它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模仿理想的必然联系,以及它作为模仿倾向于将自身与现代艺术发展所敌对的审美相结合。将神话伪装为历史这类的例子日益增多。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对“理想”的历史相对论缺席渐增的主观不满和焦虑,这种状态创造了寻求填平文学决定性现实的“超级结构”(文学史的伪

历史模式)与表征性“表层结构”之间鸿沟的“新历史相对论”的欲望和预期。需要质问的是:浪漫主义现在为何物?过去又为何物?这一事情曾经发生什么吗?这些问题日益难以予以确切表述,但是问题自身持续有意义。浪漫主义问题不再以我们仍然习惯的方式被质问,广而言之,通常联系浪漫主义的遗传和固有模式已失去了它们的权威。

### 三 浪漫主义与文学分期:过去的未来

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方法在跨越历史与文学之间的鸿沟时,提供了一种理论阐释模式:文学史被理解为“读者、反应批评家、在自己持续生产中的作者三重维度的文学文本现实化中所发生的一种审美接受和生产”<sup>[17]29</sup>。文学史实践常规原料以及持续增长的文学“事实”的总结,仅仅是这一过程的余渣,是被收集、归类的过去,因此根本不是历史,而是伪历史。历史接受理论的未来必须明显地在它自己的条件中等待它自己的审美接受过程,也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正参与其中的过程。作为那个过程的部分,我们能够质问,对我们的理解而言,这种理论可能的涵义是什么,以及一个文学时期观念的可能再界定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姚斯的理论中看到,它仅仅是一种精心制作的再界定文学史为文学历史的历史,或者某种可以听起来日益熟悉的再表述。有机世界的所有进程是不断超越和征服的进程,以及所有超越和征服意味着再阐释、再设置,在此过程中更早的意义和目的必然要么暗淡要么丢失<sup>[17]36</sup>。与之更近地,巴赫金教导我们复调性地对话化,寻求一种所有语意现象开放性的读解。姚斯试图给予我们一种可理解的历史界定和永久更新的文学史重述,但其自身并没有一种目的论或者一种叙述结构,而是将我们理解“事情像他们所是”的能力置于对之再重述之中。他试图超越常识的观察,历史事实不是被给予而是被建构的,试图给予我们一种再界定历史学识真实可靠的模式。这种“新历史相对论”怎样影响我们思考文学时期的能力,尤其是怎样影响我们对浪漫主义的思考?

如果贝特所言的那种“转变”的确发生,那么它发生在我们的思想中;如果“古典传统”的确存在,则存在于“西方思想”中。这意味着贝特表述中争议的历史时刻,事实上它的言说时刻在 1982 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在我们时刻浪漫主义的主导观点仍然是贝特的“创造性想象”,尽管它可能 10 年或者

15年前一直盛行。如果它仍然盛行,仅仅是因为我们当前浪漫主义“重述”有着暂时的惰性,以致贝特浪漫主义时期的生产主义观念自身是一种简单接受时期的标记。像所有文学现象一样,文学时期不是事实给定的,而是持续地改变的历史建构。一旦一个时期的一般概括或多或少“定型”(主要作者、标准化的文本和它的时间跨度被分配),就可能几乎无止境被修改和再拟定。甚至同一批评家或者理论家能够修正他自己的先前接收条件。构成一个短暂浪漫主义想象的作者群体被认为具备成员资格,然而群体中的个人性作者的身份也在不断改变。如许多读者仍然阅读的布莱克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接受现象,很大程度上被弗莱和布鲁姆构建,然而布鲁姆随后的批评对之持续地再界定,对布鲁姆而言,布莱克现在比浪漫主义作家更接近蒲伯,连同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也有了新的看法。在1956年美国语言协会的《浪漫主义诗人:研究评论》中没有给布莱克安排一个位置,直到1966年版本他才被添加其中。再如,艾布拉姆斯在对主要浪漫主义作家研究界定中,给予济慈简短的承认而忽视拜伦,完全因为“拜伦对浪漫主义同代人的预言立场的讽刺视野”<sup>[4]</sup>42。

麦克甘(Jerome McGann)和里德诺尔(George Ridenour)的争论占据1977年发行的《浪漫主义研究》大部分篇幅,引导关于拜伦在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位置专栏。里德诺尔对麦克甘提出异议,因为后者没有足够地强调拜伦的《唐璜》的浪漫主义本质<sup>[18]</sup>。里德诺尔反对“浪漫主义作家”作为一个封闭的事实实体,批评“已经成为浪漫主义批评常识的东西”<sup>[18]</sup>。麦克甘则严肃质疑关于浪漫主义传承的批评表述,质疑阻止我们看到拜伦传统的持续性以及他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中位置的持续性的时期划界。尽管他也不满浪漫主义运动的“事实”,反对“我们提出作为事实考虑的理论”<sup>[19]</sup>,但是麦克甘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即关于里德诺尔的观点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事实”基础,以及多大程度上它们证明了一个时期观念持久地连续变化(再组织),通过一种我们整套的期待以及我们的发展方向建构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文本及其各种序列。

我们因此在这种微小但典型的交流中有一种“真理时刻”,反对了姚斯的提议。我们能够仅仅释放一般看来构成并揭示了“浪漫主义”真理的决定性历史事实,去拥抱里德诺尔—麦克甘的交流本身作

为构成浪漫主义的“历史”吗?要如此做,就要放弃里德诺尔假定的时期历史类型的可能性:一个时间过程,或者它的片断,能够被共时、单一时刻把握。如果如此,我们可能与之一道走向令人反感的历史相对论,在最为传统形式即创造了总体化结构但随后又在一种形而上学的“现实原则”下掩盖它的创造的方法论,切身目睹一种“处于不断再形成自身的过程中”的历史相对论观念是否也能提供那种“形成”得以发生的必然基础。这也意味着一种付出和获取,二者是体验和评价同一特色的不同方式。我们必须放弃自身仅仅赋予的历史的短暂当前意义,这种意义将成为经由持续被重述而构成历史未来阅读的产物(作为接受)。我们赢得了意义的可能性,但必须承认那种意义是我们的而且仅仅是我们的。这很像弗洛伊德的“延迟行动”(deferred action)观念,认为体验、印象以及记忆的追溯可能在一种后来时期吻合了新近的体验或者吻合了一种新的发展阶段而被修正。这种暂时形式排除了在一个事件的自我包含时刻理解事件本身的可能性。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阐述的经典断言:“历史地运作的反思从未能充分地完美结束,但是这种不完美不是因为反思中任何瑕疵,而是基于我们所是的历史存在的本质。要历史地存在意味着从未通过自我认知要被耗尽。”<sup>[20]</sup>285我们能够有用地质问“新的”争论点和一个永远未完成的结构体的元语法可能性。

文学史及其分期的现实将始终被我们占有成为一种形式欲望的对象,我们满怀使之可取又要将之完结的欲望为之赋形,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既客观真实又符合一种欲望模式的潜在的文学系统法则。但是只要我们的欲望保持模棱两可,这种法律将不在一种明确的真理中揭示我们自身。我们可能将文学的历史解读为一种自治论的话语形构历史,或者视其为一种唯物主义形构的结果或影响。要如此,就要反复在话语中续写真实差异的欲望的浪漫主义话语,带着这种可能性,欲望及其努力是所存有的唯一变化。时间之流中,种种文学事件构成了不同的时期,其本源既是对历史的解构又是对历史的建构,既是历史消费亦是历史生产,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层面,由此形构了文学历史的永无休止的生成与延存。

## 参考文献:

- [1] Jacques Derrida. The Law of Genre [J]. *Critical Inquiry*, 1980, (7): 57-65.
- [2] A·W·施莱格尔. 浪漫派风格[M]. 李伯杰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3] Tzvetan Todorov. *Theories of the Symbol*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4] M·H·Abrams.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M]. New York; Norton, 1971.
- [5]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赵登荣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7.
- [6] Hayden White.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J]. *Critical Inquiry*, 1980, (6): 21-32.
- [7] Paul de Man. *Blindness and Insigh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8] 罗兰·巴特. S/Z[M]. 屠友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9] 卢卡契. 现实主义辩[C]//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0]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时间的种子[M]. 王逢振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11] 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M]. 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12] 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徐文博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13] W. J. Bate. The Creative Imagination: Enlightenment to Romanticism[J]. *New York Review*, 1982, (18): 24-31.
- [14]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M]. 吴松江, 张文定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15] 雷蒙·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 王尔勃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 [16] 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 [17] 汉斯·姚斯.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18] George Ridenour. Don Juan in Context[J]. *Studies in Romanticism*, 1977, (Fall): 42-59.
- [19] Jerome McGann. The Romantic Ideology[J]. *Studies in Romanticism*, 1977, (Winter): 55-67.
- [20] 伽达默尔. 哲学阐释学[M]. 夏镇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Romanticism and Literary Periodization in the Western Context

LUO Xi-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A serious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theoretical periodization is of necessity to confront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for in the historical moment of our think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two are usually viewed as antagonists in a variety of theories and ideologies. The various criteria for mapping history into periods is the result of prior intellectual commitments in the context of what constitutes one's own "period". The periodization of history continues to bear the ideological stamp of Romanticism. A rethinking of the periodization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manticism can illustrate the view that the multiplicity is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historical transitions.

**Key words:** period; literary periodization; Romanticism

[责任编辑:张思武]